

# 1958年鄧小平在解放軍 「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摘 要

1980年代中共重新評價與檢討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的錯誤，其中，鄧小平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然而，卻無專文探討鄧小平當年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為。本文的論點為：基於毛澤東的授意、鄧小平自身與軍隊的淵源，以及其職位上與軍務的聯繫，鄧小平對於軍中發起的「反教條主義」，了解知情外，其態度傾向支持，甚至頗為激進。在毛澤東的囑咐下，鄧小平更介入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強勢地驅策主軍的彭德懷改變會議的議程，掀起「反教條主義」的最高潮。鄧小平在肯定會議批判方向的前提下，僅出面保護其昔日戰友劉伯承，使之免遭劫難。經由本文的討論，亦能對其他若干流行的中共黨史觀點，提出有別既往的思考和啟發。

**關鍵詞：**鄧小平、中共解放軍、反教條主義、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 \* \*

## 壹、前 言

1950年代中期，中共解放軍出現的「反教條主義」聲浪，本是軍隊內部針對先前學習蘇聯軍隊經驗中，出現照抄照搬、忽視國情之情形的一種檢討和反思。然而，隨著情勢的演變而發生激化，在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達到最高峰，造成軍方高層人事的一波衝擊和整肅。其對軍隊訓練、教育以及規章制度造成的負面效應，更持續超過20年。其中之教訓和代價可謂慘痛。

對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重新評價與定位，鄧小平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其作為甚至被譽為「一項提挈全軍的重要決策」。然而，在此「撥亂反正」的過程中，有一特別的插曲：1980年，為了讓軍中院校教育能無所顧忌、更健康的發展，中共軍方總參謀長楊得志、副總參謀長楊勇和張震，感到1958年「反教條主義」有需要加以回

顧、評估，期以「以正視聽」，並決定請示鄧小平。<sup>①</sup>然而，楊得志等人在熟悉相關歷史問題之後，一度有所顧慮，感到茲事體大。其原因在於：鄧小平正是 1958 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重要關係人和當事者，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楊得志等在向鄧小平匯報此事時，直陳自己擔憂「這不是反到你頭上來了嗎？」<sup>②</sup>眾所週知的結果的是，鄧小平不但不規避自身對其的涉入，更直言當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從而為該事的「翻案」提供了依據與憑藉。

中國大陸現有探討 1958 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文獻不在少數。當論及鄧小平此一「高風亮節」之行為時，無一不對鄧的相關勇氣和果斷感佩不已。然而，迄今尚未有專文針對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以及軍委委員的鄧小平在當年軍隊「反教條主義」中的角色和活動進行討論，成為相關研究的一大空白和缺憾。鄧小平當年對軍隊反對「教條主義」持以什麼態度與立場？影響鄧小平參與其中的因素為何？鄧小平在「反教條主義」集中表現的 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扮演何種角色、採取哪些作為？本文試圖對上述問題加以解答。

本文論點為：基於毛澤東的授意、鄧小平自身與軍隊的淵源，以及其職位上與軍務的聯繫，鄧小平對於軍中發起的反對「教條主義」，了解知情外，其態度傾向支持，甚至頗為激進。在毛澤東的囑咐下，鄧小平更介入 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強勢地驅策主軍的彭德懷改變會議的議程，掀起「反教條主義」的最高潮。鄧小平在肯定會議批判方向的前提下，僅出面保護其昔日戰友劉伯承，使之免遭劫難。

本文之目的在於：在資料極為有限的情況下，<sup>③</sup>試圖勾勒出鄧小平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中參與和活動的主要面貌和經緯，冀以對「鄧小平研究」和相關歷史的認識有所裨益。文內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概有四個部分：一、討論影響鄧小平與聞解放軍「反教條主義」之因素；二、檢視鄧小平對 1958 年夏以前軍中反對「教條主義」問題的態度；三、探討鄧小平對 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介入的情形。最後在結論的部分，簡單說明此一討論對一些流行的中共黨史觀點所帶來的啟發。

註① 楊得志在抗日期間活動於冀魯豫軍區，曾作為 1958 年軍隊「反教條主義」主要批判對象劉伯承的部屬；楊勇更長期作為共軍「二野」的主要幹部，與劉伯承上下工作關係密切。張震與同樣在 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遭受打擊的粟裕在戰時有長時期的共事關係，接受粟裕的直接領導。楊得志、楊勇、張震等人在發起重新評價軍隊「反教條主義」問題時，或也有為其舊時領導恢復名譽的考量。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年），頁 263~364。楊尚昆，「深切哀悼楊勇同志」，*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248~251。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頁 194~196。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就此點的提示。

註② 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頁 252。

註③ 由於在資料上無法取得一手的官方檔案，本文主要運用回憶錄與相關的研究文章。正因史料文獻的難以齊備、完整，在此議題的研究與分析上，不免存在若干不甚清楚而有待有關材料進一步面世方能釐清的問題。另外，文中所使用的相關文獻材料，也因多出自於中國大陸，其內容多少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與影響。例如：蕭克是 1958 年中共軍隊「反教條主義」中的「首犯」和關鍵人物之一，然而，在其回憶錄裏關於該事件過程的敘述中，竟無任何一處論及鄧小平當年在其中的角色和活動。「為尊者諱」無疑是最優先的考量。如此自亦有可能對於本文對事件的判斷和解讀，造成一定的困難與障礙。特此說明。

## 貳、影響鄧小平與聞與作為之因素

### 一、毛澤東的授意與要求

中共建政後同任中共黨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至死方休的毛澤東，在國防軍權上是大權獨攬的。<sup>④</sup>但毛對軍務並非事必躬親、也不是事不分大小。毛澤東對於以對之忠誠為基礎的高級將領任命權，以及軍隊調動的權力，絕不假他人之手，也斷不容他人染指。如：對軍隊進行調度和指揮上，鄧小平即曾表示：「我是總書記，調兩個團到北京也不行。」<sup>⑤</sup>黨章明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因發出戰備的「一號命令」，不慎犯了毛的大忌，不但引發其猜疑，更為兩人後來的分道揚鑣埋下重大的因子。<sup>⑥</sup>

然而，在軍隊一些屬於事務性的問題上，毛澤東讓其他人置喙的空間，就較為寬鬆，甚至是發生與毛意見相左的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有關兵役制度的爭論。毛澤東傾向採行志願兵制度，<sup>⑦</sup>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則主張義務兵制度，為此，二人還曾當面爭執。<sup>⑧</sup>1958年2月，毛澤東再次提出恢復志願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達到高潮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的前夕，4月8日，有關兵役制的問題，在鄧小平支持下，由其主持擬寫的中央決議獲得通過，明確「現行的義務兵役制不變」。<sup>⑨</sup>毛澤東的政策偏好，竟也可遭到捨棄、束諸高閣。

解放軍「反教條主義」原是一如何看待學習蘇軍經驗的事務性、技術性的問題，卻因逐步滲入加強黨對軍的掌控、離蘇走出中國自身道路等的高度政治考量，而趨於複雜化和敏感化。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積極過問和強力干預後，涉及此一問題的政策辯論和人事較勁，都出現急轉直下的變化，終而導向毛的意旨的方向發展。

在處理該問題的過程中，毛澤東親自「點將」鄧小平參與其事，「推之不恭、卻之不敏」，鄧小平自然無法迴避、閃躲。鄧小平晚年回憶時即表示：「當年我是反教條主

註④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18。

註⑤ 1978年11月27日，針對「二月兵變」的問題，鄧小平說：「我那時就說那個事不可靠。」我是總書記，調兩個團到北京也不行。那時規定，調一個連，歸大軍區管；調一個營，歸軍委、總參謀部。」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頁229。

註⑥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頁14-15。

註⑦ 毛澤東認為靠義務兵役制積蓄後備力量太少、太慢，不夠因應戰爭時期補充、擴大部隊的需要。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185。

註⑧ 曾任國防部長彭德懷辦公室主任的王焰表示，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對彭德懷因誤解而不滿的事情之中，包括：毛幾次提出欲將義務兵役制改為志願兵制度，在全國實行義務全民皆兵的民兵體制，彭表現不積極，甚至還同毛當面進行爭論，引毛不快。陳宇，「彭德懷的軍事秘書談彭德懷」，**軍事歷史**（北京），第5期（1998年），頁8-9。

註⑨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676。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7、243。

義領導小組組長，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辭。」<sup>⑩</sup>在毛澤東態度堅決、觀點鮮明的情況下，鄧小平在「反教條主義」中的相關作為，縱帶有其個人的堅持和自主性，也是「萬佛不離其宗」。

## 二、鄧小平與軍隊的淵源

中共是「馬上得天下」、「槍桿子出政權」。在此過程中鄧小平有豐富的沙場閱歷和令人刮目相看的戰功。鄧小平早年曾在廣西領導農民武裝運動、開闢根據地；對日抗戰時期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國共內戰期間出任中共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在中共與國民政府的關鍵決戰—淮海戰役中擔任總指揮，擘畫「百萬雄師過大江」，而後率兵直驅西南，統兵一方。中共軍方在評比軍銜時，也曾規劃授予鄧小平元帥之銜，惟因其轉任政職而未果。<sup>⑪</sup>鄧小平對於自身赫赫的戰績，頗自鳴得意。<sup>⑫</sup>晚年還曾自豪地表示：「我的真正專業是軍事。」

1958 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宣稱要對中共建政以後的軍事工作做一次全面性的檢視和檢討。對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而言，鄧小平無疑是一個適合的協助人選。鄧小平與軍隊有較多的聯繫，乃為毛所注重。<sup>⑬</sup>另外，鄧小平在軍旅生涯中雖然多擔負的是政治委員的職務，但不同於如聶榮臻、羅榮桓以政治工作為主的角色，鄧小平實際參與指揮作戰。在特別講究論資排輩、作戰經歷的軍中，享有頗高的威望。<sup>⑭</sup>鄧小平對曾立下彪炳軍功的軍曾加以「品頭論足」時，不會有「壓不住腳」的狀況，也能避免文武相忌的情形。

然也正因為鄧小平在軍中儲有豐沛的人脈，參與對軍隊的整肅不免有「投鼠忌器」情事的發生。特別是當軍委擴大會議改為聲討其多年夥伴劉伯承之後，鄧小平如何在公私之間取得一適當顧及情誼而在政治上又不失分的平衡，確實是一個棘手的考驗。

## 三、鄧小平在職位上與軍務的聯繫

鄧小平自 1952 年上調北京之後，平步青雲，迅速躋身中共最高領導層。1954 年

註⑩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辦公室，「一項提挈全軍的重要決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13。

註⑪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年），頁 324。

註⑫ 文革期間，楊成武曾揭發：鄧小平以為自己有兩大功勞，一是他認為淮海戰役有了不起的功勞。他自以為「你從東北打到海南島，我從南京打到成都。」「你有遼瀋戰役，我有淮海戰役。」另一個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修鬥爭中，以反修「英雄」自居。「楊成武同志狠揭鄧小平」，譚放、趙無眠選輯，**文革大字報精選**（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 年），頁 130~131。

註⑬ 例如：1952 年 7 月，彭德懷被任命主持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時，曾舉薦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一職。對此，毛澤東肯定了鄧小平的才能，並認為鄧同軍隊有較多的聯繫，是適合的人選，然因鄧初就政務院副總理，從現在的崗位上抽不出來而作罷。《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年），頁 494。

註⑭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所提供之觀點。

出任中央秘書長，1956年「八大」出任中央總書記，主管黨的日常工作。<sup>⑤</sup>毛澤東對鄧小平刻意栽培，將鄧小平領銜的中央書記處定位為「什麼事都要管」的「黨中央的辦事機構」，「抓全面工作，發文用中央名義」，<sup>⑥</sup>也強調書記處對「承辦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一般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轉出去。」<sup>⑦</sup>易言之，中共軍方上呈中共中央等待批覆的各類文件，鄧小平不但多可過目經手，有時甚至可以代表中央予以裁示。例如：1957年7月1日，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彭德懷6月底呈送毛和中央審閱準備在國防委員會上的講話稿批示並許可。<sup>⑧</sup>1958年6月18日，彭德懷向中央報告「甘肅藏族地區的反革命叛亂活動」情形以及擬因應處置的方針和做法。鄧小平以中央書記處為名閱後批覆「同意」。<sup>⑨</sup>

鄧小平由此對於軍方的動態和軍隊的相關事務，具有一定程度的熟稔和了解，進而成為黨與軍之間的重要連結者。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乃是中共中央在各領域加強黨的控制之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sup>⑩</sup>毛澤東之下，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對軍隊強化、貫徹「以黨領軍」，<sup>⑪</sup>既順理成章，亦能駕輕就熟。

此外，鄧小平擔任一項職位，使之較諸其他文職的中央領導人能與軍方保持更密切的互動，也就是鄧小平兼任了中央軍委委員的身分。1954年9月28日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擔任主席，另有11名軍委委員。鄧小平以外，其餘10人即是後來冊封的「十大元帥」。1956年中央軍委會人員組成雖有擴大，但無礙於鄧在其中的地位。身為軍委委員，鄧小平更直接與聞軍中的重大政策和活動如：參與軍銜的評定。<sup>⑫</sup>1958年軍隊反對「教條主義」，軍職在身的鄧小平有資格與聞其詳，進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 叁、1958年夏以前鄧小平對軍中「教條主義」的態度

註⑤ 鄧小平被毛澤東迅速拔擢的因素，可參閱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40-145.

註⑥ 李雪峰，「從建國初期到『文革』期間」，李穎、程美東主編，*與鄧小平一起親歷歷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08。

註⑦ 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總第297期（1996年），頁8-9。

註⑧ 對於彭德懷此篇「關於軍事建設問題的報告」，鄧小平在該講話稿上批道：「我詳細看了一遍，認為可以，只在個別地方作了小的修改。」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191。

註⑨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687。

註⑩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3), pp. 293-296.

註⑪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6, 360.

註⑫ 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提供之觀點。

## 一、1956、57 年：鄧對相關問題已有所注意

鄧小平對於如何在學習蘇軍經驗同時又能不失中共軍隊本色的問題，乃是相當關注，很早即予以注意。

1956 年 3 月 17 日，在一次有各大軍區首長參加的軍委會議上，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黃克誠傳達說：「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對於軍隊如何保持優良傳統的問題曾有指示，即在實行軍銜等一系列正規制度之後，擔心我們軍隊的優良傳統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政治工作、群眾路線、黨委領導等，應該引起嚴重警惕。讓各軍區、各院校、各部門加以檢查。」<sup>⑳</sup>毛、鄧相關指示的提出和學習蘇軍經驗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

1956 年春夏之際，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外國經驗，進而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提出「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此背景下，解放軍也結合自身的工作進行參照、反省和檢查。然而，在軍中職司訓練的部門和單位中，卻在如何學習蘇軍經驗問題上引發爭論。

對於軍中在「反教條主義」上所引發的爭議，鄧小平因為身居黨軍要職，不但不能置身事外，更成為下級上書請願的對象。例如：1956 年 11 月，先前在訓練總監部工作、後轉任軍事學院戰史系教授會主任的蔡鐵根（這兩個單位後來被指為是深受「教條主義」貽害的「重災區」），寫信給鄧小平，表示「深深感到北京存在著嚴重的軍事思想上的混亂，急需提請中央和軍委領導上的注意」。其信中認為近年來軍隊在學習蘇軍經驗上，乃是「割裂開來，隨意取捨」，「結果弄得四分五裂」，應該要「真正地全部融會貫通以後，才談得到批判。」<sup>㉑</sup>蔡氏這種意見，有別於近來中共中央所提的警惕、克服教條主義傾向的呼籲，反而認為學習蘇軍還不全、猶不足，可能會半途而廢、甚而誤入歧途。面對此一不「和諧」的聲音，鄧小平將此信轉給主軍的彭德懷，讓後者知曉有此情形。

鄧小平轉寄給彭德懷的蔡鐵根的信，再加上約此同時，主管全軍院校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對軍事學院學習蘇軍經驗上頗有微辭的調查報告，促使彭德懷決定親自前去調查。

1957 年 2 月底至 3 月初，彭德懷與陳賡、譚政等赴南京軍區和軍事學院進行考察。3 月 2 日，彭德懷聽取軍事學院領導幹部匯報中也相應發表談話。彭指出：「在學校教學中，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sup>㉒</sup>「在反對教條主義問題上，黨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明確地積極地進行領導」。<sup>㉓</sup>彭德懷後來將此次談話紀錄加以修改，亦即「在聽

註 ㉑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頁 545。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90-91。

註 ㉒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頁 546-547。

註 ㉓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501-502。

取軍事學院匯報中的談話」，並於4月24日附信呈送毛澤東。其觀點獲得毛的批覆同意。彭德懷亦將此篇講話稿送給鄧小平。<sup>⑥</sup>經由閱讀之，鄧小平勢能即時掌握此一動態發展。

其後，彭德懷根據其先前赴華東視察情況，向黨中央和軍委寫綜合報告，並將「在聽取軍事學院匯報中的談話」納入其中。這也就是5月21日，彭德懷請毛澤東審閱之「在南京軍區視察工作的報告」。<sup>⑦</sup>毛澤東於5月29日批示：「此件請書記處處理。」鄧小平在7月2日批道：「擬同意彭總對於五個問題的意見。劉、周、朱指示後退彭總。」<sup>⑧</sup>易言之，對於彭德懷對軍事學院所作的「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估計，以及「把我軍優良傳統永久保持下去」、蘇軍經驗「應貫徹批判地學習的方針」等主張，鄧小平是支持並予以贊同的。

鄧小平此番表態，應是基於對彭德懷「有調查就有發言權」之判斷的尊重，並未徇故其與劉伯承的私情。作為軍事學院院長的劉伯承，此時雖已在休養而不具體過問院務，但該校若如同彭德懷所言犯有「教條主義」的錯誤和偏失，其之形成自非一時之結果，自1950年11月創校以來即擔任院長的劉伯承必也難辭其咎。於公，鄧小平就事論事，不橫加干涉。於私，有資料顯示，在鄧小平的勸告下，8月6日，劉伯承以「殘衰多病」為由致信毛澤東，請求辭去南京軍事學院職務並獲准同意。<sup>⑨</sup>此若屬實，鄧小平或有保護舊時戰友之意，促其及早離開可能的是非之地。

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其中關於軍隊的部分，鄧小平指出在「反右」鬥爭下，「軍隊一般比較純潔」；但由於「某些工作人員不適當地強調專業化、忽視思想政治工作等原因，幾年來，幹部的個人主義和無組織紀律傾向有了一些發展。」「軍隊在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和軍民關係等方面，也有一些缺點需要克服。」<sup>⑩</sup>

鄧小平談話裏指陳軍隊的問題時，雖然並非直接與「教條主義」禍害相聯繫，但卻多是先前中共中央批判的對蘇軍經驗不加思索、囫圇吞棗下造成的後遺症。這些不良現象與弊病，確實為鄧小平所留意並欲加以解決的。

註⑥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頁544。

註⑦ 該報告內容有：一、南京軍區設防；二、反教條主義；三、對待在軍事學院任教的前國民黨軍隊軍官的問題；四、派駐軍工廠驗收的軍代表制。五、領導工作的問題。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175~178。

註⑧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178。

註⑨ 劉伯承於1957年8月6日寫信給毛澤東：「原來就是殘衰多病的身體，勉任六年學術工作，極感吃力。自1953年患虛脫症以來，腦力、眼力、神經和創傷諸傷舊病反覆糾纏，已經難於看書提筆，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時常參加教材編審工作。」周少華，「50年代劉伯承為何主動提出與鄧小平分手」。中華網，2006年8月17日，[http://big5.china.com/gate/big5/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1129/12898105\\_1.html](http://big5.china.com/gate/big5/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1129/12898105_1.html)。

註⑩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上），第22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303~304。

## 二、1958 年春：鄧對相關問題愈加關切

自 1957 年底到 1958 年初，由於若干事件和情勢的影響，中共軍方逐步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詭譎、緊張氣氛。1957 年 10 月，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因位高權重，引起蘇共領導人忌憚而遭到整肅。此一所謂的「朱可夫事件」，再加上 1956 年「波匈事件」中軍隊不穩的教訓的影響，使得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於軍隊的穩定性和服從性，益加高度注意和小心。<sup>①</sup> 1958 年在「大躍進」醞釀、成形的過程中，軍隊與當時急欲成就一番事業的地方相比，顯得消極、滯後，對此，毛澤東指出：「以往是拿軍隊將地方的軍，現在要拿地方來將軍隊的軍了。」<sup>②</sup>在此背景下，3 月 26 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表示「今年要回過頭來搞點軍事工作」。毛在其他場合也提出「黨要抓軍隊」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正是代表黨出面「抓軍隊」的主要人物。

針對軍隊工作相較於地方顯得冷清落後的問題，鄧小平在 3 月的成都會議中表示：軍隊幹部發展不快，我們學術思想是落後的，落後的原因，是沒有深入群眾、深入實際中去。<sup>③</sup>彭德懷在與鄧小平、周恩來磋商後，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使中央軍委的決議和意圖在全軍很好的貫徹實行。經由整風，可使總部機關統一思想、理順工作關係，進而發揮積極性和效率，有力地推動全軍工作。此一主張獲得毛澤東的批准。<sup>④</sup>成都會議因此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進行整風、整編。

解放軍「教條主義」的問題，在此時並未引起毛澤東太大的注意，認為不甚嚴重。<sup>⑤</sup>然而，3 月下旬起訓練總監部召開的機關四級幹部會議，其圍繞在「教條主義」問題上的激烈交鋒，反而使之成為一令人注目的焦點。為了貫徹中央的「雙反」決定——反右傾保守、反貪污浪費，同時反教條主義，訓總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在訓練總監部部長和黨委書記蕭克的主持和引導下，針對「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傳言，主張要「從思想上澄清一下」，並將指控軍事學院教條主義嚴重的原訓總副部長、已調任總參副總長的張宗遜召回來開會，「把矛頭指向了他」。<sup>⑥</sup>

彭德懷對訓總四級幹部會議很重視，並將會議的簡報和主要發言「呈報主席、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同志閱」。針對蕭克在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上反對軍事訓練部門存在「教條主義」的指控，曾批評軍事學院「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彭德懷自然不能接

註① 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中國冷戰網，2006 年 8 月 17 日，<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dyjjrmgs/000957.html>。

註② 高連升，「淺析 1958 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軍事歷史（北京），第 1 期（1994 年），頁 9。

註③ 此出自 1958 年 5 月 3 日，彭德懷在軍委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66。

註④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56-257。

註⑤ 例如：1958 年 3 月 10 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全國解放後，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份教條，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頁 172。

註⑥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年），頁 442、446-447。



受，甚至揚言「訓總四級幹部會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sup>⑳</sup>鄧小平也抱持類似的觀點。例如：相關文件送達中共中央後，鄧小平曾在一份關於訓總四級幹部會議的簡報上批道：「方向不對、風氣不正、水平太低」。<sup>㉑</sup>即可反映鄧小平對之不甚滿意的立場。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也在中央軍委強行干預下不了了之。

4月26日，軍委發出召開擴大會議通知。4月29日，黃克誠主持由軍委委員和各總部領導出席的座談會，討論擴大會議整風如何統一認識的問題。會中，黃克誠表示：「成都會議提出，地方比中央部門進步，軍隊幹部更落後。小平同志對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也提出這個問題，感到軍隊幹部落後，講不出道理來。」<sup>㉒</sup>值得觀察的是，鄧小平將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中所出現的「教條主義」嫌疑者的頑抗，同軍隊幹部落後連結在一起。易言之，由鄧看來，軍隊思想之所以「冥頑不靈」，「教條主義」責無旁貸、罪不可赦。由此也可想見，當毛澤東突然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高唱「反教條主義」之時，鄧小平不致產生需要「思想轉彎」的問題，更有可能是「得心應手」、一步跟上。

## 肆、鄧小平對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介入

### 一、奉毛之命操作會議之走向

#### (一) 會議初期的情況

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從5月24日開預備會、5月27日正式開幕。5月24日，彭德懷主持軍委預備會議並就會議主題講話，提出解決軍隊的三大問題：建軍原則、建軍方針以及戰略方針問題。反對「教條主義」則並非是會議的重點。事實上，對總參謀長粟裕的批判是會議開始後的主要焦點。軍委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做檢討，冠之以「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告洋狀」的罪名。<sup>㉓</sup>對粟裕開展批判，毛澤東是表示支持的。例如：5月30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的解決問題。」彭德懷也將問題的嚴重性與「朱可夫事件」作對比。<sup>㉔</sup>面對措詞嚴厲、接踵而至的批判，粟裕百口莫辯，僅能一再檢討。

註⑳ 同前註，頁448。

註㉑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61。

註㉒ 同前註，頁264。

註㉓ 鞠開，「二十六年蒙冤去，三十六年慰忠魂——回憶逆境中的粟裕」，**縱橫**（北京），第8期（2003年），頁11-13。梁丞，「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領導科學**（鄭州），第2期（2002年），頁42-43。朱楹，「粟裕大將蒙冤始末」，**文史精華**（石家莊），第12期（2000年），頁4-10。

註㉔ 彭德懷在會上說：「『朱可夫事件』就暴露了蘇軍在（不少地方違背列寧建軍原則）這方面的缺點……我們所以要嚴肅地批判『教條主義』，就是爲了把我軍優良傳統牢固地傳下去。不然的話，當我們這批老的骨幹逐漸死去以後，我軍就可能有像匈牙利軍隊那樣變質垮台的危險。」林蘊暉，「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黨史博覽**（鄭州），第3期（2005年），頁5。

在批判粟裕上，鄧小平的角色和作用，不下於掌軍的彭德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軍委會議批粟的同時，鄧小平召集軍隊最高層的會議在小範圍內對粟裕進行定調式的批判。5 月 26 日、28 日，以及 6 月 4 日，鄧小平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元帥會議（出席者包括：彭德懷、林彪、賀龍、陳毅、聶榮臻、羅榮桓、葉劍英七位元帥以及黃克誠、譚政、蕭華。）鄧小平和彭德懷、陳毅、聶榮臻、黃克誠等發言批判粟裕。<sup>②</sup>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對軍委擴大會議「督軍」的角色，不言可論。

此一階段的軍委擴大會議上雖也不乏對「教條主義」的批判，特別是集中在對蕭克、訓練總監部及其四級幹部會議。例如：6 月 5 日，蕭華在會議的小型會議上的發言中說，訓總的爭論是路線鬥爭。羅榮桓更於 5 月 23 日即表示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上的爭論，「實質上是兩條路線鬥爭」。<sup>③</sup>但主持會議的彭德懷卻不作如是想。5 月 31 日，彭德懷邀集張宗遜、蕭克、李達、彭紹輝、李作鵬座談時表示：「你們對敵鬥爭都很堅決，不搞陰謀，不想推翻誰，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問題。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訓，不追責任。」「今天講清楚，不是整倒哪個，只是把相互間的成見、意氣消除掉。」<sup>④</sup>從中可以發現彭德懷雖然對於軍中訓練部門「教條主義」有所不滿，但是尚持以對事不對人的態度。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毛澤東開始過問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發展，更以「教條主義」為清算目標。在毛的示意下，本已插手軍委擴大會議的鄧小平，自然而然地作為毛對會議進行指導的首要代理人。

## （二）毛澤東幕後主導、鄧小平台前引領會議發展

毛澤東何以會做出相關的決定和舉措？最流行的說法是林彪帶有趁機打擊他人的「政治投機」目的，向毛「獻計」的結果。林彪在 1959 年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也不無得意地回味他在 58 年會議走向上所發揮的「先知先覺」的作用。<sup>⑤</sup>即便如此，關注「教條主義」問題者並非林彪而已，海軍副司令員方強就是一個例子。其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並對之造成的影響，恐亦是不相上下。

5 月 29 日，方強就會議的開法給會議主席團寫了一封信，闡述自己的意見，要求會議「以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面的工作」。6 月 5 日，彭德懷將該信轉呈毛澤東。同日，毛澤東對方強的信做出以下批語：

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彭、黃、鄧看後還我。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個小組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

針對方強在信上所寫「我們的建軍方針、建軍路線、戰略方針」「是不存在什麼根

註②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年），頁 627。

註③ 齊德學，「彭德懷與 1958 年反教條主義鬥爭」，**軍事歷史**（北京），第 5 期（1998 年），頁 46。

註④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 685。

註⑤ 同註③。

本性的問題的」，毛澤東批示：

一方面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就整個歷史說來不佔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著，及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最後，毛澤東寫道：

彭黃閱後退小平：有些同志對會議的開法感到不滿。此事容易，調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氣，大有可為。請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志經常談一下，似可不必開小型會，只開大會和小組會。如何，請酌定。<sup>④</sup>

由以上批語顯示，毛澤東希望改變會議的開法以「振起生氣」，借重鄧小平就是其所做的重大安排。鄧小平和作為會議主持人和組織者的彭德懷、黃克誠，也可從中知道毛澤東已將打擊、清算「教條主義」作為會議後續的主軸。<sup>⑤</sup>

6月7日凌晨4點，毛澤東專門致函鄧小平：

小平同志，六、七月你應做兩件事：一、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關鍵是本月一個月，宜與彭等少數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來幹，多快好省。

軍事會上，你應準備去講一次，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sup>⑥</sup>

就此一短函之內容作分析：毛澤東親自授命鄧小平以「協助」、「輔導」的角色參加後續的軍委擴大會議。鄧小平被任命為所謂的「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的時

註④ 「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60-261。

註⑤ 中共對「教條主義」的界定，在於革命理論和外國經驗是否與中國實際作適當地結合。易言之，當革命理論和外國經驗在現實中的運用，沒有顧及中國具體的環境和條件而出現機械式的套用之時，就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由於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向來宣稱、強調「教條主義」在中共革命建政過程中所曾造成的危害，因此「教條主義」的罪名是相當嚴厲的指控。然而，在評定「教條主義」問題上，卻充滿了主觀的隨意性，沒有任何清晰的判斷標準。在模糊的定義下，存在寬廣的操作空間，往往「鬥爭意涵大於實質問題的處理」，成為享有優勢權力者開展政治鬥爭收放自如的口實，並讓批判對象難以為己辯駁。所謂中共軍隊「教條主義」問題，即是共軍在移用、參照蘇軍經驗時是否得宜的問題。如本文所述，中共中央雖在1956年即要求軍隊對這一問題予以注意，但毛澤東本人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時還不看得很嚴重。然而，僅三個月之後，毛卻改變其原先的看法，進而決定改變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議程，發動批判「教條主義」，由此可見其任意性。毛澤東在短時之內思想上出現轉折和變化的原因，以及其所可能抱持的意圖為：一、鑑於此前蘇聯與波匈的教訓，藉此「殺雞儆猴」強化對軍隊的領導；二、配合中共當時嘗試走出自身發展道路的企圖，先破再立，在軍隊中排除蘇聯過多的影響；三、因應「大躍進」的形勢需要，在思想上對軍隊進行動員，使之跟上並投入；四、回應中共黨內、軍中要求重視相關問題的聲音（包括鄧小平在內），以示其傾聽下級、關注問題。

註⑥ 「關於做好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和開好軍委會議問題給鄧小平的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頁264。

間，也或是在此前後。<sup>④</sup>毛澤東委派鄧小平的任務是「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究其實質乃是責成鄧小平扮演「監軍」的地位，從旁推促彭德懷將會議導引至為毛澤東滿意的方向和結局。

6 月 7 日上午，鄧小平立即召集林彪、彭德懷、羅榮桓、葉劍英、黃克誠開座談會，商談截至當時為止會議開會的情形和後續會議的開會方式等兩項問題。由此亦可推測，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此前必曾針對會議的相關問題當面交換意見，鄧小平方能對前者的意圖和所望「心領神會」，迅速予以貫徹。帶有「衛君命」身分的鄧小平，其在此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指示，可從黃克誠當日下午所作的傳達內容中顯現。

黃克誠在下午全體大會上傳達說：

- 一、對前幾天會議的估計。小平同志認為，會議的「溫度」不夠。意思大體上是說，只有 35 度，沒有 37、38 度，更沒有 40 度。暴露問題不夠，在同志們思想中存在的意見是很多的，是多方面的，從建軍原則、方針，領導方式方法，到許多工作的具體措施都有意見，還沒有端出來，應當鼓勵大家擺開。
- 二、今後會議的開法，決定採取機關整風的辦法，不再開小型會，只開小組會和大會。寫大字報、小字報，配合大會、小會的發言，爭取在一週內造成鳴放的緊張氣氛。希望同志們大膽發言，以共產主義的風格提意見，把話都講出來。批判的對象，主要應當是對軍委、總部。軍委和各總部的負責同志要沉住氣，聽別人把意見講完，再展開辯論，進行專題鳴放，然後就爭論結果分別起草文件（即決議草案）。這些文件主要依靠下邊的同志幫助各總部寫。<sup>⑤</sup>

鄧小平所說的「會議溫度不高」，指的是在前一階段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會場上對批判「教條主義」的發言不甚積極、踴躍的現象。<sup>⑥</sup>此一情形是毛澤東不樂見的，需要有所改變。激起眾人對「教條主義」的「義憤」，不但勢在必行，更是鄧小平職責所在。在後來的會議期間，鄧小平曾對軍事「教條主義」作過一比喻：「學習蘇軍先進經驗，好比請客吃飯。別人請你吃飯是好意，你吃了拉肚子，這埋怨誰？只怪你自己吃多了，或者你胃腸消化不好。這要堅持實事求是。」<sup>⑦</sup>易言之，鄧小平認為那些犯「教條主義」者，正是對蘇軍經驗僵化地生吞活剝，脫離中國的實際所鑄下的錯誤。自我不爭氣、自誤誤己、怨不得人。鄧小平鼓勵與會人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橫眉冷對」、不吐不快。事實上，主要就是針對陷入或涉嫌「教條主義」錯誤的個人。所謂「造成鳴放的緊張氣氛」，就是要專門對「教條主義」者鳴鼓攻之。

黃克誠在傳達的尾聲強調：小平同志還提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以後，地方工

註④ 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提供之觀點。

註⑤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286-287。

註⑥ 吳欣峰，「1958 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炎黃春秋*（北京），第 1 期（2004 年），頁 8。

註⑦ 同前註。

作更加活躍了，軍隊的這次會議要開好，工作也就會大大活躍起來。開不好，大家就下決心不要回去。一直到開好才算。<sup>⑤</sup>鄧小平強勢的政治風格和令到行止的決心，從中呼之欲出。

對於鄧小平受毛澤東指示介入會議的情形，黃克誠晚年回憶時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央委託鄧小平召集各位元帥開會，認為軍委擴大會議溫度不夠高，決定採用整風方式開會，會議發言與大小字報相結合，一周內使空氣緊張起來。」<sup>⑥</sup>

在毛澤東拍板決策、鄧小平傳達與部署之下，會議氣氛急轉嚴峻，會議原主事者彭德懷、黃克誠，頗感意外地流於被指揮的地位。黃克誠後來坦言：「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sup>⑦</sup>

### （三）會議掀起高峰

自覺年事已高、知識不足而感倦勤的彭德懷，在此不久前曾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請求。6月9日，經由毛澤東主持、鄧小平撰寫會議結論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後，決定「沒有必要加以改變。」<sup>⑧</sup>對於軍委擴大會議甫由毛澤東欽定的以批判劉伯承、蕭克為中心的「反教條主義」議程，彭德懷「作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馬上投入新一波的戰局。同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會議要擴大範圍。會議後來因而形成千人的規模。

6月20日，軍委擴大會議舉行全體大會，正式出席者逾千人。彭德懷代表主席團講話，提出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從戰爭年代教條主義的危害，講到全國勝利後軍事教條主義的復活，認為教條主義是反對毛澤東建軍思想和戰略方針的。<sup>⑨</sup>毛澤東顯然很重視彭德懷相關講話的內容，認為彭確切地掌握到毛要大反「教條主義」的意圖。當日即批轉給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常委，並強調「此件值得一閱」。<sup>⑩</sup>毛澤東也不吝親臨會場演講或召集會議主要人員與談。21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講話。23日，召集軍委委員和各組組長舉行座談；29日，召集各組組長座談會，適時對會議的重點做出指示。毛澤東也多次批轉「大躍進」的相關文件，<sup>⑪</sup>試圖用「大躍進」引發的奮進心理和

註⑤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頁686。

註⑥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46。

註⑦ 同前註，頁247。

註⑧ 當時萌生退意的除了彭德懷以外，因「反冒進」被批而鬱鬱寡歡的周恩來亦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也同樣受到慰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紀要，1958年6月22日，鄧小平手稿。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396頁。

註⑨ 林蘊暉，「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黨史博覽**（鄭州），第3期（2005年），頁4-9。

註⑩ 毛澤東批示：「劉、鄧、朱、周、陳雲同志，此件值得一閱。閱後退彭。」《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頁544。

註⑪ 例如：6月22日，毛澤東對薄一波因應6月18日會議討論而修改的《匯報提要》（「以鋼為綱」的源起），一方面，改用正副兩道標題，正題是《兩年超過英國》，副題是《國家經委黨組向政治局的報告》；另一方面，作了批示：「此件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724。

樂觀展望，感染、激勵軍方要「敢想敢闖」，揚棄教條、不墨守成規。

較諸數度掛帥上陣的毛澤東，此前受毛委託參與對會議方向操作的鄧小平呢？就目前可得的資料，有關鄧小平在會議轉入「反教條主義」階段後其活動的蹤跡，竟屈指可數。6 月 29 日上午，毛澤東再次在中南海游泳池住所召集小組長座談時，鄧小平和彭德懷、林彪、賀龍、陳毅四位元帥陪同毛澤東，一起聽取匯報並共同給予指示：教條主義的錯誤是我們自己犯的，不能推之於顧問和蘇聯；破除迷信，總結自己豐富的作戰經驗作為教材，其原則是「以我為主」，參考友軍，研究敵軍；一個農業合作社、一個工廠在破除了迷信之後都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東西來，而幾百萬軍隊也應該能搞得出自己的一套來。<sup>⑩</sup>此乃在會議後期鮮有能具體反映鄧小平和毛澤東等人在相關問題上「同呼吸、共命運」的紀錄。

然而，按照毛澤東先前所作的指示：「請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志經常談一下」（6 月 5 日在方強信上的批語）、「宜與彭等少數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6 月 7 日致鄧小平函）。鄧小平對會議的進展難以袖手旁觀。鄧小平更有可能是在幕後頻仍地擔負起毛澤東和一線執行開會任務的彭德懷、黃克誠之間來往穿梭的聯絡人、上令下達的督戰者之工作。

7 月 19 日上午，彭德懷作會議總結。下午，鄧小平也遵奉 6 月 7 日毛給其的信中所提「軍事會上，你應準備去講一次，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的指示，在懷仁堂報告「大躍進」如火如荼下的國內形勢。鄧小平作為中共推行「大躍進」的主要執行者，<sup>⑪</sup>對這一運動規劃的美景必能如數家珍，讓聞者如臨其境、感動不已、浮想聯翩。在聽眾席上的將官們確實經由鄧的介紹感到「前途的確令人樂觀興奮」，<sup>⑫</sup>進而在「反教條主義」打破思想、精神的枷鎖和禁錮後，勇往直前地獻身於以「敢叫日月換新天」為職志的「大躍進」運動。

7 月 22 日，會議在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後宣告閉幕。

## 二、對劉伯承加以保護

### （一）毛、彭對劉的嚴批

在毛澤東決定改變會議議程大打「教條主義」後，因為與「教條主義」最有連帶關係和「嫌疑」，雖已「南山歸蔽廬」的劉伯承自難逃一劫，先遭「缺席審判」，而後赴京待命檢討。

毛澤東對劉伯承的批評是不假辭色的。例如：6 月 23 日，毛澤東針對訓練總監部和軍事學院表示：「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毛更直指劉伯承個人：

註⑩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年），頁 127~128。

註⑪ 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第 13 卷第 2 期（總第 93 期）（2006 年 6 月），頁 94~105。

註⑫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 312。

伯承身上的舊軍閥習氣就完全沒有嗎？當著他的面我也要說，我看還是有的。他一到蘇區，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塊兒，軍事上完全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那一套。抗戰時期，好一點。解放戰爭初期，特別是進入大別山，也不行。辦了軍事學院，好為人師，搞起了老本行—教條主義，莫誤人子弟。㉓

毛對劉所作的嚴厲批判，無疑為全面批劉開了綠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前兩天，5月25日，林彪方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㉔林彪向毛澤東建言軍委會議方向後，欲在批劉上掄元再立新功，不令人意外。彭德懷也與毛澤東一搭一唱相應和。例如：前述的23日的同一場合，彭德懷表示：「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彭更將批劉「教條主義」結合歷史舊事，直稱：「不要忘了，紅軍時期，教條主義可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毛澤東順彭附和：「教條主義真是害死人唷！」㉕毛、彭唱和下，劉伯承的處境因而益加艱困。至於被毛指為「壞人」的蕭克，彭德懷改變5月底有意轉圜的初衷，對蕭進行嚴打。隔年換彭德懷遭殃、倒楣的廬山會議期間，毛在對彭進行清算時仍表示兩人在「蕭克的事合作很好」。㉖彭德懷事後覺得對蕭愧疚，說當時批判「言過其實」、組織處理「並非出於我本意」，業已惘然。㉗

## （二）鄧在批劉上面臨的兩難與對策

對於鄧小平而言，如何處理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劉伯承，實是一個兩難議題。

一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委託操作軍委會議走向、改以「反教條主義」為會議宗旨的人，若迴避批判作為「教條主義」代表性人物的劉伯承，不能「身先表率」，恐有遭人非議之虞。

尤有鄧小平要謹慎處理之處：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的前後，鄧小平在中共黨政權力分配上的地位，可謂是炙手可熱、權傾一時。例如：5月25日八屆五中全會上，李富春、李先念進入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以便把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的

註 ㉓ 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南昌），第1期（2005年），頁31。

註 ㉔ 林彪在當時受到毛澤東重用的原因，可參閱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8.

註 ㉕ 彭德懷指控劉伯承之事乃是：中共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四方面軍曾將一批軍、師幹部送到由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時任紅四方面軍三十軍軍長的余天雲因學習不適、甚而引發爭吵，促使劉伯承親自處理此事。余氏卻因不服管教而自殺身亡。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南昌），頁31-32。

註 ㉖ 廬山會議期間，8月1日的常委會上，毛澤東指稱彭德懷：北京軍事整風（整蕭克、粟裕），找我談，並沒有衝突起來。有時互相客客氣氣。蕭克的事合作很好，這因為跟你有利，需要幫忙。（彭：這不是我個人事。你是軍委負責的。這幾個同志犯大錯誤，應予處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238。

註 ㉗ 1962年，彭德懷曾委託其姪有機會代他向蕭克道歉。齊德學，「彭德懷與1958年反教條主義鬥爭」，*軍事歷史*（北京），頁46。

一些問題提到書記處討論」。<sup>⑧</sup>會議也決定由中央主辦出版理論半月刊**紅旗**。在毛澤東親自擬定的編委名單中，鄧小平名列首位。<sup>⑨</sup>在毛澤東的倡議之下，6 月 10 日，中共中央發通知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規定若干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直接向其作報告。6 月 8 日，毛曾特別為此說明：「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sup>⑩</sup>

經過密集的人事和組織調整，中央書記處一躍成為規劃部署的指戰部和承上啓下的樞紐點，領銜書記處的鄧小平又因身為常委得以與聞大政方針的擬定，成為一個既參加最高決策又擔負統籌執行責任的關鍵角色。<sup>⑪</sup>毛澤東委派鄧小平至軍委擴大會議「監軍」，既從另一個側面反映毛對鄧的信任和器重，然而，毛澤東是否想藉此，尤其是批劉伯承的問題上，考驗大權在握的鄧小平對之的政治忠誠，也非完全不可能。

另一方面，在抗日戰爭時期與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與劉伯承並肩作戰，人多以「劉鄧」稱之。兩人工作風格相補，配合默契甚佳。<sup>⑫</sup>對此，曾一同共事的薄一波即形容兩人的「團結合作和真摯友情，在黨內、軍內一直傳為佳話」。<sup>⑬</sup>換言之，與劉伯承相知甚深、甚至自己過去的勳業與之密不可分的鄧小平，眼見劉「虎落平陽」必感不是滋味，「見死不救」也於心不忍。

相權之下，扭轉會議對劉伯承的批判已是不可能，硬行為之也不甚明智，甚至有引火燒身的可能，鄧小平對批劉持以「同意對之批判，但須有所限度」、「批判其教條主義的錯誤，但不應將之一桿子打死」的立場。

### （三）鄧在保劉上的作為及取捨

會議揭發、批判、檢討「教條主義」的聲浪，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氣氛下只增不減。會場中批評涉及劉伯承個人的部分，上綱上線之高，批判炮火之猛烈，可以繼劉接任軍事學院院長的廖漢生所作紀錄為證。廖當時受劉伯承囑託，為之整

註⑧ 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前引書，頁 1396。

註⑨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頁 1141。

註⑩ 毛澤東批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毛澤東對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1958 年 6 月 8 日。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前引書，頁 1396。

註⑪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111~112, 117.

註⑫ 「劉鄧」曾被周恩來稱之為一組「舉輕若重」（劉伯承）和「舉重若輕」（鄧小平）的組合。薄一波，「師長與戰友一回憶劉伯承同志」，**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頁 119。

註⑬ 薄一波回憶：「他（劉伯承）和小平同志共事多年，工作中始終事互相切磋，互相支持，配合得十分默契。每次召開軍事會議，討論作戰方案，在最後下決心以前，伯承同志都要請小平同志發表意見，並且常常在會議結束時宣佈：就按小平同志的意見辦。小平同志對伯承同志也是非常尊重和關懷的。」薄一波，「師長與戰友一回憶劉伯承同志」，**領袖、元帥、戰友**，頁 118。



理、歸納會上對其的批評意見，其主要內容為：「問題一不『以我為主』，不信任群眾，尊重組織不夠；原因一迷信外國，輕視自己；迷信個人，輕視群眾；迷信自己，輕視組織；性質一也是兩條建軍路線鬥爭在學院的反映。」<sup>④</sup>對於如上指控，在一次小組會上，鄧小平即針對性地表示：「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sup>⑤</sup>

鄧小平對劉伯承的保護也不限於此，其更在毛澤東面前直抒己見。在這段劉伯承度日如年的日子，時任砲兵司令員兼砲兵學院院長的「二野」舊部的陳錫聯回憶：「小平同志在懷仁堂跟毛澤東、彭總、陳總、林總一塊開會，公開站出來說：我認為伯承同志在接受黨的領導、尊重政治委員方面是最好的。」<sup>⑥</sup>另外，據鄧小平晚年自己所言：「我曾對毛主席說，你不是說二野能打仗嗎？沒有司令員，哪有我這個政治委員，打仗主要靠司令員。」<sup>⑦</sup>

鄧小平還要陳錫聯去看望劉伯承，「請他寫一個簡短的發言，他自己不能寫，讓別人代寫也可以。」劉伯承得知後堅持由自己撰寫。當陳錫聯向鄧小平報告劉因青光眼嚴重難以書寫時，鄧小平更直言：不要寫了，事情會弄清楚的。<sup>⑧</sup>

6月29日，毛澤東在指出劉伯承的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是方向問題」的同時，肯定劉工作的認真，並說其檢討發言不要寫了，也不要出席會議。會議決議不要寫任何人。<sup>⑨</sup>然而，由毛澤東在會上煽起對劉的焰火已難以收回。形勢逼人下，7月10日，劉伯承還是帶病在大會上作檢討。

7月19日，鄧小平在大會上講話時，特意表示要公道地對待劉伯承：

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們是老搭檔了，你說他犯了錯誤，我心裏那麼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這幾年工作不是都做不好，也不是過去不好。不能說他多年來做的不是好事。如果這樣說，不公道。<sup>⑩</sup>

毛澤東把劉伯承在「教條主義」錯誤的責任看得最嚴重之時，曾考慮革除劉伯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位，並徵詢鄧小平的意見。鄧小平對此明確表示異議，並為毛澤東所接受。劉的政治局委員方得以保留。<sup>⑪</sup>毛澤東之所以採納鄧小平的主張，此或因毛若欲藉「反教條主義」之名，行「敲山震虎」之實，劉伯承本處於半退休的狀態，無異於一「死老虎」，過度為難之並無太大意義。鄧小平為劉伯承仗義直言，是在響應毛澤東批判「教條主義」號召的前提下行之，與毛本人衝突不大。局面弄僵，於

註④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7。

註⑤ 王穎，「1958年中南海懷仁堂批判劉伯承時有人鼓掌」，**文史博覽**（長沙），第11期（2005年），頁8。金鳳，「劉伯承檢討前後的掌聲」，**炎黃春秋**（北京），第7期（2005年），頁29。

註⑥ 陳錫聯，「陳錫聯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61。

註⑦ 同註⑥。

註⑧ 同註⑥。

註⑨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8。

註⑩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91。

註⑪ 同前註，頁294。

己未見有利。毛澤東索性順水人情，將劉伯承「重提輕放」。

鄧小平出面相挺劉伯承，乃是一高具政治風險之舉，其政治勇氣不可謂不大。鄧小平除了要冒「有違聖上」之大不韙的危險，也要面對其他高調批判劉伯承的高級將領，對其有否為劉庇護、護短的質疑和異樣的眼光。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鄧小平對於在此次會議期間對劉伯承「得理不饒人」的主要人物—林彪和彭德懷，頗不以為然，甚至留下了芥蒂。1972 年 8 月 3 日，在「林彪夜遁逃，大火自焚燒」後，鄧小平寫給毛澤東效忠兼自省的信中，回顧此事猶耿耿於懷地表示：

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裡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sup>⑳</sup>

鄧小平也知道，其對於林、彭「貶劉褒鄧」的做法的不領情，好比讓後者「熱臉貼冷屁股」，易使對方感到「裏外不是人」而對己心生不悅。

鄧小平「白首話當年」強調「反教條主義」時：「迫於毛主席的決定，進行了批判，但我還是保護了一些人，特別是劉帥。」<sup>㉑</sup>鄧小平不願對劉伯承「割袍斷義」，奮而挺身而出，確實是鄧從政上不失光彩的一筆。但對於其他在會議上被批判的人，卻鮮有跡象顯示鄧小平曾出手奧援，即便是曾屬其麾下的「二野」舊部。

時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兼計劃和監察部部長的李達，過去作為劉伯承、鄧小平征戰南北時重要而得力的助手，擔任「劉鄧」參謀長長達 14 年，輔弼立功無數。<sup>㉒</sup>在此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也成為「眾矢之的」而「中箭落馬」。1959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轉發解放軍總政治部的《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中，李達和蕭克等人甚至被打成「反黨分子」。迄今並無資料證明鄧小平曾為其說項、辯護。事實上，鄧小平在「有所取捨」下也是愛莫能助，只能忍痛任之而去。

因為鄧小平已經力保劉伯承，在此情況下，鄧小平縱使對舊屬李達有所同情，也不便出手。何況其他元帥對於同一「山頭」的「失足者」也多是袖手旁觀。例如：林彪對同是「四野」的蕭克不念舊情，對陳伯鈞視若無睹；陳毅得知毛澤東對粟裕所作「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的評價後，在 7 月 14 日粟裕第 2 次於大會上檢討、並對指控他的「罪狀」幾近「照單全收」後，方略向粟致意以外，<sup>㉓</sup>

註 ⑳ 鄧小平，「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 年 8 月 3 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年）。

註 ㉑ 張震，「在小平同志領導下作戰與治軍」，中央文獻研究室、解放軍檔案館編，回憶軍事家鄧小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28。

註 ㉒ 南啟，「劉鄧的好參謀長李達」，黨史博采（石家莊），第 11 期（2000 年），頁 18-20。

註 ㉓ 在粟裕第二次大會檢討之前，毛澤東評價粟：「粟裕同志戰爭年代打仗打得好，是為公的。到北京以後是為公還是為私？不能說都是為私吧！請大家來判斷。」徐慶全，「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歷程—訪粟裕夫人楚青」，炎黃春秋（北京），第 2 期（2004 年），頁 2。

也未聞其曾對師出「三野」的鐘期光、宋時輪有所表示。易言之，為防落他人之口實，鄧小平對於李達以及當年曾任「二野」第四兵團副司令員的郭天民，<sup>86</sup>未置一詞，就算不是「揮淚殺馬謖」，也是「棄軍保帥」下的權宜之計。<sup>87</sup>

但對於李達在 1958 年所受到的不平對待，鄧小平是牢記在心的。在隔年，亦即 1959 年 12 月，鄧小平派李達至山東西部（鄧當年所領晉冀魯豫野戰軍的活動地）「慰問看望鄉親」，<sup>88</sup>多少具有不忘舊誼的意味。1973 年鄧小平於「文革」期間復出工作時，也特別過問李達在 58 年所遭受的打擊。<sup>89</sup>1980 年代，當年「反教條主義」被指為是錯誤後，李達多年冤屈方得以洗雪。1989 年 11 月 20 日，鄧小平在會見編寫「二野」戰史的老舊屬時，多處提到李達的「當年之勇」。<sup>90</sup>對於曾賦詩自名「錯反『教條』，整兩帥，蒙冤作了替罪羊」的李達，<sup>91</sup>「老長官」鄧小平表彰其戰功，對之或許有補償的意味。李達晚年談鄧小平時讚譽有加，對自己在 1958 年「反教條主義」所受的迫害，則隻字不提。<sup>92</sup>

## 伍、結 論

本文所探討的主題，雖然在若干細節的部分，仍有諸多模糊、渾沌之處。例如：鄧小平身為「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但該建制的屬性、地位、組成人員以及詳細的運作情形，卻晦暗不明，使外人無法洞悉。成為本文無法對相關問題作更深入剖析的一道障礙。但是，鄧小平在 1958 年中共解放軍「反教條主義」始末中之重要而突出的角色，直是無庸置疑。首先，從事態發展的過程析之，鄧小平從初始即密切注意軍中有關「教條主義」的問題和弊病，並與主軍的彭德懷在這方面保持密切的往返工作聯繫。鄧小平對軍隊「教條主義」爭論的掌握，讓黨中央和毛澤東不但能及時知悉情況的變化，鄧在此一問題上愈益激進的態度，必也會對毛對「反教條主義」的決斷產

註<sup>86</sup> 畢健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沿革」，*黨史研究資料*（北京），第 4 期（1984 年），頁 18。

註<sup>87</sup> 針對匿名審稿人所提出之「反教條主義」對於個別的野戰軍勢力如「一野」、「二野」之影響的問題，作者認為並不明顯。一方面，受到「反教條主義」衝擊者，不侷限、集中於單一的野戰軍勢力，亦即沒有誰特別蒙害或得利的問題。就算統兵「二野」的劉伯承在此事件中直接受到傷害，作為「二野」另一位「大家長」的鄧小平，也仍巍然不動。「二野」因而也不會有「蛇無頭而不能行」的問題，另一方面，曾領兵「一野」的彭德懷，表面上在「反教條主義」中叱吒一時，然其次年即落難於廬山，若欲藉此「擴大戰果」，也為時不及。

註<sup>88</sup> 中共山東省委，「功高泰山，恩澤齊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220。

註<sup>89</sup> 何立波，「『稱職的好參謀長』李達上將」，*文史天地*（貴陽），第 2 期（2005 年），頁 27。

註<sup>90</sup> 例如：鄧小平表示：「一二九師能在華北堅持下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比日軍更精幹的參謀班子。」時任參謀長即是李達；對於解放戰爭期間爭取高樹勛倒戈一事，鄧小平強調：「我們是派參謀長李達親自到馬頭鎮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這件事你們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庄金興、夏明星，「被譽為『諸葛先生』的參謀上將李達」，*黨史博采*（石家莊），第 1 期（2005 年），頁 40~41。鄧小平，「對二野歷史的回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36~343。

註<sup>91</sup> 何立波，「『稱職的好參謀長』李達上將」，*文史天地*（貴陽），頁 26。

註<sup>92</sup> 李達，「李達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頁 62~71。

生影響。其次，在「反教條主義」白熱化的 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鄧小平更銜毛之命在會議中推促彭德懷將「反教條主義」升級加溫，開展對犯錯人士的大批判。鄧小平在不辱使命地執行相關任務時，力能所及地對戰時同袍劉伯承予以適時的關照。如此也可顯現鄧所具有政治性格和能量。

經過對鄧小平相關角色和活動的重建，1958 年中共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歷史圖像和個人責任問題，也已能較完整地釐清和界定：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權毫無疑問地為毛澤東所掌控；林彪發揮的至多是火上加油的作用；<sup>⑭</sup>鄧小平擔任傳達、部署以及監督的職責；彭德懷和黃克誠則負責實際執行和具體落實。

1958 年中共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對於其後中共軍隊發展的傷害與破壞，在此也宜作一簡單探討，以明確作為「反教條主義」的關鍵主事者之一的鄧小平從中所應擔負的責任問題。「反教條主義」對中共軍隊造成的貽害主要有：

一、對軍中高層風氣的不良影響：「反教條主義」除了讓前述的若干高級將領受到批判，甚至被迫去職、轉業，例如：蕭克轉任農墾部，李達調去國家體委。該事件對於軍中高層的行事作風與風氣，更造成了惡劣的示範效應。「只唯上，不唯實」，秉承上意，對批判者上綱上線，也不容之為己辯白。此例一開，中共軍隊高層後續又發生多次這種政治高壓下不講原則的大批判與殘酷鬥爭。事隔一年的廬山會議上，在 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賣力演出的彭德懷，也遭到一樣的方式對待而遭罷官、下野。這也是彭個人政治命運的悲劇所在。

二、對軍中訓練部門和相關工作人員的衝擊：1958 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之召開，原先的目的是整風整整編。整編的原因係針對中共解放軍的組織體制存在的「機關龐大、部門過多、組織重疊、分工機械」的現象。<sup>⑮</sup>然而，在會議轉向批判「反教條主義」後，統管全軍軍事訓練的訓練總監部，意外地成為首當其衝的部門。尤其當該部的以蕭克為首的領導紛受批判、調職後，訓練總監部被撤銷建制、劃歸總參謀部。<sup>⑯</sup>與此同時，負責管理幹部的總幹部部也因工作與總政治部多有重疊，而併入總政治部。<sup>⑰</sup>至此，中共解放軍的組織體制，從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訓練總監部、總幹部部五總部，恢復為 1950 年代初的三總部建制。伴隨著「反教條主義」的聲浪與訓練總監部的裁撤，全軍中職司訓練、院校教育的各級幹部，士氣大受打擊，即便未連帶受到懲處，然因相關職務不受重視，也不敢強化自身專業需求，大大挫傷其工作幹勁。為此抑鬱不得志者，不在少數。

三、對軍隊訓練工作的負面影響：部隊由於軍中展開「反教條主義」與批判

註 ⑭ 林彪在軍隊「反教條主義」中所發揮的負面作用和影響，中國大陸過去將之過度誇大，指控其為最重要的策劃人與加害者。有些通行的說法，例如：林彪在 1958 年 3 月成都會議期間即積極謀劃此事，業已被證明為不實。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pp. 179~180. 此外，更有資料顯示，林彪曾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其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該年 5 月起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但為毛所不許。洗維月，*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104~105。

註 ⑮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 60 年大事記*（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 年），頁 570。筆者感謝林蘊暉教授提供此一資訊。

註 ⑯ 孟東，「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建立與撤銷」，*黨史博覽*（鄭州），第 10 期（2002 年），頁 49~52。

註 ⑰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頁 334~335。

「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出現對訓練要求、教學課程不重視，甚至對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不分好壞地加以破壞的情形。對此，中共「海軍之父」蕭勁光就曾予以批評。<sup>97</sup>後來在 1990 年代曾作為軍方在中共黨內最高代表的劉華清，回憶此事時也指出軍隊由於「大搞突出政治，削弱了軍事訓練，幹部的思想比較迷惘」。<sup>98</sup>

經由本文的討論，亦能對其他若干流行的中共黨史觀點，提出有別既往的思考和啓發。首先，鄧小平與林彪的關係。中國大陸的出版物都將之刻劃為「漢賊不兩立」、「道不同不相為謀」，以至於「勢如水火」的態勢。然而，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鄧、林各自無論是基於迎合毛澤東的旨意或自身認為確有解決該問題的需要，甚至是謀政治前途的動機，兩人直接或間接地為此攜手合作。雖然中間夾雜一些歧見，特別是對劉伯承的問題，但雙方至少是擁有共識、共同將會議朝同一方向推進。鄧小平與林彪在中共其他重大決策和運動上，可能存在的主動或被動的協作關係，值得予以關注和發掘。<sup>99</sup>

其次，鄧小平與軍隊的聯繫。鄧小平與軍隊的關係，一般多以鄧在中共建政前的戎馬經歷和功勞為主要、甚而是唯一的內容，更進一步地視之為鄧在毛後問鼎江山的關鍵原因。<sup>100</sup>向來受到忽視的是，鄧小平長期代表黨對軍隊事務的經手處理。1958 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此前和過程中，鄧小平活躍的身影即可集中反映此一事實。鄧小平在反對「教條主義」時以黨之名所立的「軍威」，再加上其平常處於連結黨軍的橋樑式的位置，<sup>101</sup>如此不但增加鄧從黨、從全局處置軍隊問題的閱歷，也長時積累其與軍中將領接觸、熟悉的經驗，終而成為一筆難能可貴的政治資產。

最後，鄧小平與其他人的互動。彭德懷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問題上態度的變化及其原因，確值得予以特別的說明。彭德懷針對軍中「教條主義」的問題，相當注意。不但親作調查，也表明其自身對涉及相關弊端之部門和人士的批評和不滿，例如：軍事學院、訓練總監部和蕭克。彭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原本僅想保持在工作上就事論事的責難。這也是何以彭德懷未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的初期特別議論「教條主義」的原因。然而，當毛澤東決定大反「教條主義」，並要鄧小平輔助彭為之以後，彭德懷一改初衷，進而順承毛意，對事也對人地向劉伯承、蕭克等人進行猛攻，為會議的激化和「反教條主義」的變質，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圍繞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鄧小平與分管軍隊的彭德懷之間對「教條主義」現象的認識和態度，雖多保持一致，但是對中央軍委會會議應當走向和涉及「教條主義」過失者的處

註 97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年），頁 204~205。

註 98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年），頁 281。

註 99 鍾延麟，「『次位繼承人』的安排與部署—毛澤東與鄧小平、林彪關係發展之研究」，發表於「第三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歷史發展」研究生工作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4 月 29 日），頁 1-23。

註 100 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p. 67-68.

註 101 在一些情況下，鄧小平更直接負責與軍事相關的工作。例如：1962 年，針對台灣的國民政府可能採取的反攻計劃和行動，中共中央與軍委對此作出佈置以因應。其中，鄧小平被委派分工負責軍工生產的任務。王凡、東平，**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 年），頁 136。

理，則有所區別、差異。譬如：鄧小平受毛澤東之命驅策彭德懷對整個會議加大批判力道；然在看待劉伯承的「錯誤」上，鄧又認為彭言行偏激、過頭。這對鄧、彭後來關係的影響為何，以及對鄧、彭之間往來「和諧」的制式說法，產生多大的疑難，確可加以追蹤。

與此相仿的是，有關鄧小平和葉劍英在後毛時期共同與聞「扭轉乾坤」的良好默契和情誼的討論，長篇累牘、不可勝數。葉劍英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時也受到不小的波及，<sup>⑩</sup>「督軍」、「壓陣」的鄧小平在葉受到為難時有否反應、有何作為，應也是深入探討鄧、葉關係時必須面對的一樁歷史疑問。

\* \* \*

(收件：95 年 8 月 23 日，複審：95 年 10 月 2 日，接受：95 年 11 月 10 日)

---

註 ⑩ 單世聯，「眼底吳鉤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二十一世紀**（網路版）（香港），總第 9 期（2002 年 12 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1172.htm>（2006/8/15）。

# Deng Xiaoping'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Anti-dogmatism" Rectification of 1958

*Yen-Lin Chung*

## Abstract

The 1980s witness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cluding Deng Xiaoping, in an effort to reexamine and revise the mistakes of the PLA's "Anti-dogmatism" rectification campaign of 1958. This study discovers that Deng not only aware of the PLA's involvement, but supported it actively owing to Mao Zedong's order, and his own career considerations. Accordingly, Deng interfered the enlarged Military Affairs Committee conference in 1958 and urged Peng Dehuai to launch harsh attacks on the so-called "dogmatism" within the PLA. In so doing, Deng tried his best to protect his wartime partner Liu Bocheng.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hed some new light about the CCP history.

**Keywords:** Deng Xiaop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ti-dogmatism; enlarged Military Affairs Committee conference in 1958

### 參考文獻

- 于光遠，**我憶鄧小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中共山東省委，「功高泰山，恩澤齊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06~225。
-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辦公室，「一項提挈全軍的重要決策」，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中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509~519。
- 毛澤東，「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60~263。
- 毛澤東，「關於做好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和開好軍委會議問題給鄧小平的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264。
-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 王凡、東平，**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
-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 王穎，「1958年中南海懷仁堂批判劉伯承時有人鼓掌」，**文史博覽**（長沙），第11期（2005年），頁4~9。
- 朱楹，「粟裕大將蒙冤始末」，**文史精華**（石家莊），第12期（總第127期）（2000年），頁4~10。
- 庄金興、夏明星，「被譽為『諸葛先生』的參謀上將李達」，**黨史博采**（石家莊），第1期（2005年），頁37~42。
- 何立波，「『稱職的好參謀長』李達上將」，**文史天地**（貴陽），第2期（2005年），頁22~27。
- 吳欣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炎黃春秋**（北京），第1期（2004年），頁6~11。
-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
- 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北京），第4期（總第297期）（1996年），頁8~12。
- 李雪峰，「從建國初期到『文革』期間」，李穎、程美東主編，**與鄧小平一起親歷歷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05~213。
- 李達，「李達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62~71。
-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一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9年）。



- 周少華，「50年代劉伯承為何主動提出與鄧小平分手」，**中華網**，[http://big5.china.com/gate/big5/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1129/12898105\\_1.html](http://big5.china.com/gate/big5/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1129/12898105_1.html) (2006/8/17)。
- 孟東，「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建立與撤銷」，**黨史博覽** (鄭州)，第10期 (2002年)，頁49~52。
- 林蘊暉，「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黨史博覽** (鄭州)，第3期 (2005年)，頁4~9。
- 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中國冷戰網**，<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dyjjrmgs/000957.html> (2006/8/17)。
- 金鳳，「劉伯承檢討前後的掌聲」，**炎黃春秋** (北京)，第7期 (2005年)，頁28~31。
- 金沖及主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
- 洗維月，**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 (香港：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60年大事記** (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
- 南畝，「劉鄧的好參謀長李達」，**黨史博采** (石家莊)，第11期 (2000年)，頁18~20。
- 徐慶全，「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歷程——訪粟裕夫人楚青」，**炎黃春秋** (北京)，第2期 (2004年)，頁1~7。
- 高連升，「淺析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軍事歷史** (北京)，第1期 (1994年)，頁7~10。
- 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 張震，「在小平同志領導下作戰與治軍」，中央文獻研究室、解放軍檔案館編，**回憶軍事家鄧小平** (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年)，頁21~30。
- 梁丞，「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領導科學** (鄭州)，第2期 (2002年)，頁42~43。
- 畢健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沿革」，**黨史研究資料** (北京)，第4期 (1984年)，頁14~19。
- 陳宇，「彭德懷的軍事秘書談彭德懷」，**軍事歷史** (北京)，第5期 (1998年)，頁2~9。
- 陳錫聯，「陳錫聯談鄧小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54~61。
- 單世聯，「眼底吳鉤看不休——葉劍英與『文革』」，**二十一世紀** (網路版) (香港)，總第9期 (2002年12月)，<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21172.htm> (2006/8/15)。
-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 (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
- 楊尚昆，「深切哀悼楊勇同志」，**追憶領袖戰友同志**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頁248~251。

- 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年）。
- 齊德學，「彭德懷與1958年反教條主義鬥爭」，**軍事歷史**（北京），第5期（1998年），頁45~46。
-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
-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
-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上）**，第22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年），頁292~308。
- 鄧小平，「對二野歷史的回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36~343。
- 鄧小平，「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8月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年）。
- 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南昌），第1期（2005年），頁26~32。
-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薄一波，「師長與戰友一回憶劉伯承同志」，**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頁112~128。
- 鍾延麟，「『次位繼承人』的安排與部署—毛澤東與鄧小平、林彪關係發展之研究」，發表於「第三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歷史發展」研究生工作坊（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4月29日），頁1~23。
- 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當代中國研究**（普林斯頓），第13卷第2期（總第93期）（2006年6月），頁94~105。
- 鞠開，「二十六年蒙冤去，三十六年慰忠魂——回憶逆境中的粟裕」，**縱橫**（北京），第8期（2003年），頁11~13。
-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 譚放、趙無眠選輯，**文革大字報精選**（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年）。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3).
- Teiwes, Frederick C.,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p.55~94.

Teiwes, Frederick C.,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Teiwes, Frederick C.,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